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Zai Yanan Wenyi Zuotanhui
Shang De Jianghua Yanjiu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研究

刘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Zai Yanan Wenyi Zuotanhui
Shang De Jianghua Yanjiu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研究

刘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刘忠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2-007567-6

I. 在… II. 刘… III. 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作研究②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IV. A84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029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

刘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3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7567-6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引论 现代视野中的《讲话》研究

作为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讲话》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上承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下启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创造性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有关《讲话》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经过一代又一代理论家的阐发,已经成为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它不仅规范、指导着新中国的文学实践,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朝着经典化、原点化方向发展。

综观《讲话》研究的漫长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一)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期(1942—1949);(二)激进而曲折的学习期(1950—1976);(三)反思与批评的争议期(1977—1989);(四)拓展与多元的发展期(1990年至今)。

一 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期”

《讲话》是延安时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一部分,是解放区文艺的纲领性文件。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讲话》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效地解决了文艺界、思想界的混乱与争端,发挥了文艺的动员和战斗功能。作为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讲话》很好地处理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把五四新文学的“大众化”理想变成了现实,与当时的创作实绩相比,《讲话》显示了理论上的超前性和指导性。这一时期,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和周扬、林默涵、艾思奇、何其芳、刘白羽、丁玲等作家、理论家的阐释与实践,解放区催生了一大批反映新人物、新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讲话》发表后,不仅在解放区以文件、会议、媒体等形式广泛传播,而且通过何其芳、刘白羽等人带到了国统区,在那里进行学习讨论。至今,“小鲁艺”、“大鲁艺”说(毛泽东)、“有经有权”说(郭沫若)、

“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文献”说(周扬)、“革命文艺的新方向”说(何其芳)、“人民文艺”说(林默涵),仍葆有其理论的鲜活性、实践的指导性。可以说,它们开启了《讲话》研究的先河,起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础、确立方向的作用。《讲话》发表不久,远在重庆的郭沫若就表示“凡事有经有权”,意思说文艺问题有经常恒久的道理,也有权宜之计。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郭沫若这一说法很是欣赏,引为知音^①。今天,“有经有权”说同样适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评价布莱希特的时候,说他的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还具有“后现代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作品对我们今天“有用”,这种有用性为我们提供了“伟大的方法”^②。杰姆逊的说法与郭沫若的“有经有权”说是一致的,应该看到,《讲话》考察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和实践原则是属于“经常的道理”,是今天和将来仍然“有用”的“方法”。

1944年7月,延安出版了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首次把毛泽东的《讲话》与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相提并论,周扬在“序言”中指出:“他们的意见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之下,针对不同具体问题而发的,但是他们中间却贯串着立场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最科学的历史观点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之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它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它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③从当时的情形看,周扬的这些评价不仅是个人的认识,也代表了整风学习之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集体认识——在实践中与工农兵相结合,转变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

二 激进而曲折的“学习期”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文学艺术亟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生活、新气象,“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讲话》对新中

^①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②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作家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国文学发展和文论建设起着前所未有的纲领、指导、规范作用”^①。1949年7月2日至19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在这个会议上，周扬明确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 这里，潜在的逻辑是解放区文学的方向就是新中国文学的方向，新中国文学的方向就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工农兵方向。就文学批评而言，周扬也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互相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实践证明，50至70年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严格限定在《讲话》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元论轨道上，鲜有不同的声音，更不要说争鸣。

伴随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的开展，文艺界开始建立以《讲话》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体系。全国高校的文艺学教学和教材都明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冉欲达编著的《文艺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李树谦、李景隆编著的《文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山东大学中文系编著的《文艺学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6月）、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2月、8月）、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等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强调，有的甚至从体例设置到章节命名都是对《讲话》的引述与演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被霍松林、李树谦、李景隆、吕荧等人视为“当然”的理论，贯彻到教材的编写和日常的教学。1957年“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打击和破坏了一些作家、理论家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使他们不同程度地都患上了“政治恐惧症”，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三十万言书”、巴人的“人性论”、钱谷融的“人学论”，以及文艺界在有限范围内掀起的有关“典型”、“共鸣”、“形象思维”的讨论，刚刚透出一点健康的信息，就被视为“异

① 山东大学中文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发展的新阶段》，《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

②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页。

端”，遭到打击和批判。这些，在客观上都阻碍了《讲话》研究的深入，僵化、图解之风日盛，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批评占据了上风。

1956年7月，毛泽东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命题，同年8月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时的讲话》中，他说，艺术要兼收并蓄，广泛借鉴。1958年4月在新民歌运动中，他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原则。1961年1月在接见何其芳时，毛泽东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共同美”一说包含有对“阶级性”的某种矫正。这些提法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观点，共同构筑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不过，此一时期，由于文艺政策的日渐“左倾”，《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革命案”、“反右”斗争、修正主义批判等，已经显露出《讲话》的歪曲化、工具化倾向。越来越多的政治干预严重阻碍了人们对《讲话》中“文艺为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四类人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主导观念的理解，不仅“人民”概念剔除了“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经由“工农兵”一步步简化为不食人间烟火、不要个人情感的高、大、全英雄人物，而且也放弃“艺术标准”、“艺术美”等审美准则，把“政治标准”无限放大，升腾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唯一法则。

“文革”时期，文艺界成为“重灾区”，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作家、艺术家只能写政治、演政治，“三突出”、“三结合”、“主题先行”理论严重窒息了作家的主体精神和艺术活力，《讲话》研究不仅没有获得合乎逻辑的发展，反而被绝对化、工具化，处于失语和缺席状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被曲解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运动服务，“十七年文学”成就遭到否定和批判，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建设也被武断地说成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戴上“反对歌颂工农兵，反对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反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反对文艺界展开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腐朽东西的斗争”三大罪状^①。整个文坛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硝烟，许多抒写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被诬为“毒草”，样板戏文学的舞台上活跃着的是一群经过主流意识形态抽取、纯化的“三突出”形象。

^① 《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红旗》1967年第8期。

三 反思与批评的“争议期”

从“文革”结束到 80 年代末,《讲话》研究进入到一个反思与批评的争议期。这一时期,给《讲话》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的是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的发表。1979 年 10 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主张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搞阶级斗争论,并针对文艺界的新情况,果断地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拨正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而解除了长期困扰作家、理论家的思想枷锁。与此同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在各地组建,1978 年 12 月“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在武汉成立,1980 年 7 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毫无疑问,《祝词》的发表和“二为”方向的提出,是《讲话》研究史上的重大转折,标志着《讲话》研究进入了一个反思与发展的新阶段。

80 年代中后期,《讲话》研究异常活跃,呈现出坚持中有发展和全面否定的两极走向。总体而言,老一辈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讲话》精神的阐释、坚守、发展方面,通过对《讲话》产生语境的回忆与描述,恢复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他们中,比较突出的有周扬、胡乔木、林默涵、温济泽、刘白羽、贺敬之、公木、陈涌、姚雪垠、欧阳山、冯德英、峻青、李希凡、黎之、艾克恩、张炯、涂途、李准、丁振海等,他们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讲话》产生的前后语境,诠释了《讲话》的历史与当下价值,如周扬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贺敬之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刘白羽的《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林默涵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张炯的《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李准和丁振海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及其发展》等,构成了《讲话》研究的正面阐释、发展一极。

与此同时,《讲话》研究的另一极则在批判声中进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在“人学”、“审美”的主张下,通过检视中国当代文学进程,对“工农兵方向”、“政治标准”等范畴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与否定,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起因和后果全部归结到《讲话》头上,如“阶级斗争论”、“政治从属论”、“机械反映论”、“外部规律论”、“变了种的儒家文艺观”、“官本位文学观”等,认为《讲话》指导下的新中国文艺发展史是一种“线性思维”的历史、“庸俗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因而也是“迷惑”的历史、“衰退”的历史、“失败”的历史。批判《讲话》的目的自然是否定《讲话》,于是,有人主张,《讲话》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新的文艺现实面前显现出尴尬。有人认为,发展和繁荣文艺创

作需要实现三个“突破”：一是突破《讲话》，二是突破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三是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通信。也有人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钢筋”（《讲话》）、“水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石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混合土。《讲话》“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讲话》开启的新中国文学是“党文化”之一部分，“视文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违背了艺术规律”。这些研究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把“僵化”、“教条”、“极左”的弊端，全部算到《讲话》头上，否定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这些研究由于把历史研究与审美研究对立起来，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无视《讲话》“非常态”与“常态”的区别，明显有失狭隘与偏颇。新中国文学的日益封闭固然与以《讲话》为代表的党的“左倾”文艺政策有关，但是，如果把它完全归之于“左倾”路线又是不全面的。超越政治决定论的狭隘思维模式，站在更高的视点上看，新中国文学意识形态化特征的形成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而且还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深层积淀有关，如政治的强控制、文化的超稳定、思想的大一统。

四 拓展与多元的“发展期”

进入 90 年代，《讲话》研究呈现出拓展与多元的态势。拂去历史的尘埃，走出庸俗社会学、政治学和所谓的纯艺术、纯审美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彼时彼地的史实还原基础上认识《讲话》、评价《讲话》、发展《讲话》，已经成为文艺界、理论界的共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接受美学等复合视角的大量运用，不仅深化了人们对《讲话》价值的认知，而且也丰富了人们对《讲话》价值的考察维度。张炯、陆贵山、童庆炳、朱寨、董学文、刘中树、陈晋、陈传才、曾镇南、张居华、曹桂芳、孙国林、黄曼君、孟繁华、李洁非、李志宏、黄也平等，或从新文学史角度论述《讲话》的大众性、民族性，或从“跨话语”角度分析《讲话》的内部结构和革命的功利性，或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分析《讲话》的突破与局限，显示了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此一时期，国外一些有关《讲话》的研究成果也被陆续翻译进来，施拉姆、迈斯纳、竹内实、墨子刻、麦克道格尔、贺大卫等人分别从延安时期的经济史、民主史、战争史、农村社会史、意识形态史等视角阐述了《讲话》的民粹性、党派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虽然这些研究大多附着于“毛主义”之上，起于“整风”，终于延安道路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实践联系起来，显得不够通透，甚至偏颇，但它们的存在毕竟拓展了《讲话》的研究空间，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思考向度的延伸,《讲话》研究步入了一种相对沉寂的阶段。置于现代视野来看,经过了活跃而偏颇丛生的“反思与批评的争议期”,《讲话》研究已经从先前的政策宣传、史料还原、文本阐释的单一层面推进到《讲话》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复合层面。坚持与发展、质疑与反思的研究理路在拓宽《讲话》研究的同时,本身也是一种丰富。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评述近年来《讲话》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讲话》的理论体系。

《讲话》的内容涉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作家与生活、作家与作品、创作与鉴赏、普及与提高等多个方面,近年,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入手,把《讲话》分解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工农兵方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从属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工农兵生活论”、“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关系以及文艺的人民性原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有学者把《讲话》研究纳入现代视野,认为《讲话》精神可以归结为实践性原则、人民本位观与民族特征,《讲话》的接受史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有学者把《讲话》的理论体系归纳为: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肯定文艺的阶级性、党性与人民性,肯定文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肯定意识共性与审美个性的统一性。还有学者从类型学意义上把《讲话》的理论体系简化为“原则论”、“方向论”、“结合论”、“使命论”、“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批评论”。另有一些学者在“回归原典”的名义下,认为《讲话》以革命的合法性取代文化的合法性,勉强完成了自身的理论生产,“它既不是一般文艺学的经典,也不是文学政治学的经典,而是革命的经典,它具有‘三非’特征:非文化性、非艺术性、非现代性”。

(二)《讲话》的美学属性。

作为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讲话》蕴涵着丰富的美学因素,但是,由于过去的研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美学价值强调不够,以致产生偏见,认为《讲话》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轻视作家主体;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轻视文艺的审美性;强调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轻视艺术标准,甚至有人以此来否定《讲话》的审美性,说它“并不是从文艺这一对象出发去探询艺术是什么,而只是从政治对艺术的亟须出发规定艺术是什么”。“《讲话》主要不是文艺内部规律的探讨,而是文艺政策的指示”。近年来,《讲话》的美学属性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版了一批相关专著,如《毛泽东与美学》、《毛泽东美学思想研究》、《毛泽东文艺美学思想》、《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取得了许多共识。

在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上,《讲话》认为艺术美以生活美为反映对象,作家在艺术表现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情趣、社会理想和思想观念投射到作品中,因此,艺术美比现实美“更高,高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关系上,《讲话》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肯定内容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关注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于内容的反作用,尤其重视人民群众的民间审美情趣。也有学者从思想与审美的对位角度提出问题,把《讲话》的美学属性概述为“大众化”、“民族化”、“功利化”。这些研究和概括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讲话》的美学天地。

(三)《讲话》的当代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不断发展,《讲话》研究也在不断地前进,从《讲话》到《祝词》再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脉相承,先进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始终在与时俱进。作为《讲话》精神在新时期的发展,《祝词》的创见不仅表现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上,更表现在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文化范式,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文化范式。在《祝词》中,邓小平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后来这一思想发展成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在“三个代表”中,江泽民指出,先进生产力为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供物质基础和保障,而先进文化则为先进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讲话》和《祝词》所指引的方向,它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同时,《祝词》的发表和“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也把《讲话》研究“在实践中坚持,在发展中丰富”的指导思想落到了实处。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理论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张,文艺在构建“和谐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胡锦涛要求“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

当然,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讲话》,人们还会从新的视角、新的层面提出新的问题,即便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

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等“老问题”，也不会停留在现在水平，而是有一个再阐释、再发现的过程。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讲话》研究正面临着这样的新课题——如何运用辩证的、历史的、美学的方法，结合新的文艺实践，吸收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的有益成分，突破误区和盲区，为其提供一个科学的创新空间。狂热之后是冷静，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历练，今天我们面对《讲话》，不仅研究心态更为平和，而且研究方法也更为理性。不加分析、盲目的颂赞固不可取，无视历史、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亦欠公允。回溯历史的点点滴滴，在社会史、文化史、文艺史的漫长河道中，以复合的视角来走近《讲话》、认识《讲话》、发展《讲话》，也许是我们亟须做的一项工作。应该看到，任何学术研究在坚持独立品格的同时，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而像《讲话》这样与中国社会实践有着很强关联的理论课题，对它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的“先见”。这是历史的理性使然，也是《讲话》的复杂性所在。研究当代文学，《讲话》是一部绕不过去的理论文献，它的接受史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

于此，我们说，《讲话》研究的深入既是文艺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愿望，在《讲话》的结尾处，他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新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6年6月

目 录

引论 现代视野中的《讲话》研究	1
-----------------------	---

上编 《讲话》产生的语境

第一章 延安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知识分子政策	3
第一节 延安时期的社会结构	3
第二节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	14
第二章 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形态	24
第一节 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24
第二节 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	38
第三章 苏共文艺政策与左翼文学传统	70
第一节 苏共文艺政策的吸收与阐发	70
第二节 左翼文学的传承与改写	77
第四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原因及过程	83
第一节 座谈会召开原因“考辨”	83
第二节 座谈会召开过程“扫描”	92

下编 《讲话》的理论价值

第五章 《讲话》的文本价值	107
第一节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107
第二节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114
第三节 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	118
第六章 《讲话》的理论品格	125
第一节 《讲话》与马克思主义	125
第二节 《讲话》与传统文化	131

第三节 《讲话》与新文学·····	137
第七章 《讲话》的文本接受·····	144
第一节 《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传播·····	144
第二节 《讲话》的学习与接受·····	158
第三节 《讲话》的版本沿革与文化迁延·····	172
第四节 《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	181
第八章 从《讲话》到《祝词》·····	191
第一节 实践品格的一脉相承·····	191
第二节 人民性的进一步实现·····	196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06

上编 《讲话》产生的语境

延安时期的社会结构	生活方式
知识分子政策	精神形态
苏共文艺政策	左翼文学传统

